

UCLA

UCLA Previously Published Works

Title

“Is Bing Xin a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冰心是华裔美国作家吗？论冰心《相片》之东方主义及种族主义批判。”

Permalink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0513d277>

Author

Cheung, KK

Publication Date

2012-06-20

Peer reviewed

冰心是亚裔美国作家吗?

——论冰心《相片》之东方主义及种族主义批判

[美国]张敬珏 / 蒲若茜 许双如 译

摘 要: 冰心发表于 1934 年的短篇小说《相片》预示了后来的后殖民主义及亚美研究学者的多种理论见解。该小说文本交织着三个层次的东方主义——传教士对中国人作为低人一等的异教徒的排斥,把亚洲人作为沉默的模范少数族裔的美国式建构,以及东方人附和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它既是对美国东方主义和中国父权制的双重批判,也为争议中的跨国被收养者文化观培养的可行性问题提供了参照。在此,冰心逆转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的摄影是为具有占有欲的殖民主义目的服务的论述,小说通过“相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殖民者之工具解构其掠夺性想象。这篇小说跨越了中国研究、华美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的疆界,对美国殖民主义的臆说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展开批评,对跨种族收养所涉及的某些文化观提出严肃的拷问。本文的分析亦将揭示出读者对冰心带性别偏见的接受。

关键词: 东方主义;冰心;跨种族收养;摄影;亚裔美国文学;种族主义之爱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677(2012)3-0005-12

初版发表于 1934 年的短篇小说《相片》表现了跨文化与跨种族之间动态关系的细致微妙,预示着后来的后殖民主义及亚美研究学者的多种理论见解。其作者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1999)于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其文学生涯,并于 1926 年获得韦尔斯利学院的硕士文凭。虽然她是 20 世纪最受尊敬的中国作家之一,但其广为人知的身份却是儿童文学作家。这篇小说发表时,中国正处于史书美(Shu-mei Shih)所称的“半殖民地”时期(1917~1937),其时许多中国作家都认同东方主义“将中国文化作为已成为历史的一页而加以条分缕析并承认西方文化的普遍有效性”(2001:x-xi),他们具有对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

主义的敏锐意识。《相片》跨种族接触的话题跨越了中国研究、华美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的疆界,对美国殖民主义的臆说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展开批评,对跨种族收养所涉及的某些文化观提出严肃的拷问。本文的分析亦将揭示出中国读者对冰心带性别偏见的接受。

《相片》通过对美国妇女施女士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描绘了东西方之间的一段不寻常的接触:施女士是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员,旅居中国 28 年,退休后,收养已去世的王先生的年仅 8 岁的女儿淑贞。淑贞 18 岁时,施女士带她回到新英格兰老家,在这里,淑贞结识了李牧师及其儿子天锡,两个青年人之间发展了一段友谊,相互之间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当看到天

作者简介: 张敬珏(King-kok Cheung)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及亚裔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蒲若茜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研究员;许双如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

锡为淑贞所拍的相片时,施女士突然决定和养女返回中国。故事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以施女士这位白人移居者的有限视角呈现的,只有施女士和淑贞在新英格兰的那一段是全知视角的叙事。

施女士最初以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及同情心的女人出现。不同于其他新英格兰的传教士,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异教徒国家,施女士却喜欢中国甚于美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从小说令人困惑的结局中,读者不难辨别出涌动于整个叙事中的一股股令人不安的潜流:施女士之东方主义者的自视优越和母性占有欲,淑贞之自我压抑以及对刻板化形象的接受和内化。

《相片》预见并证实了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著名论断:

当人们使用东方人和西方人这样的范畴作为学术分析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时……其结果通常是区分的极端化——东方人变得更东方化,西方人更西方化——并且限制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接触。简言之,从一开始直至现今,东方主义作为一种与外国打交道的思维形式,典型地显示了将任何知识都建立在这种僵化区分之上所产生的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将思维分别塞进一个西方或东方隔室。(1979:45-46)

自萨义德对那种区分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的倾向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已有过许多关于殖民主义传统的研究,包括萨义德本人的《文化和帝国主义》(1993年)。与笔者对《相片》的解读尤其相关的理论包括以下理论家的著作:郑永生(Vincent j. Cheng)、赵健秀及《唉咿!》文集的其他编辑者(Frank Chin et al)、周蕾(Rey Chow)、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多米尼加·费伦斯(Dominika Ferens)、克里斯蒂娜·克伦(Christina Klein)、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吉原真理(Mari Yoshihara)等。笔者从这些学者处获得启发,将之运用于梳理《相片》叙事的多股线索,却惊讶于这些学者的见解已然深植于《相片》的文本之中,惊讶于这位中国作家,就

像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所注意到的黑人女性作家一样,“以叙事形式进行理论建构”(1987:52)。

在《拥抱东方:白人妇女和美国东方主义》一书中,吉原真理指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东方主义最为盛行的表现就是将强大的西方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联系,处于从属地位的东方则与被动的的女性气质以及“前现代的简单、自然、传统”相联系:

在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时代,许多美国人都急于维护和保持那些被认为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的思想和价值观,例如纯洁和真诚。当美国人在亚洲艺术和文物中发现这些品质时,他们认为,生产和使用和陈列富于亚洲风格的商品将能代表和提升其道德和文化水准。(Mari Yoshihara 2003:4,23)

吉原指出,这种消费与展示,加强了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在维多利亚家庭生活中的位置,“却掩盖了其内在的性别与种族意识形态”(26)。施女士尽管长期侨居中国,但每当回到她认为文雅不足的美国,总会产生对过去传统的怀旧之情。她每隔七年回一次位于新英格兰的家乡,但对她而言,这家乡已不复有家的感觉。她对粗鲁的美国青年感到恼火:“对于他们……的长辈,竟然没有丝毫的尊敬和体恤。他们只是敷衍,只是忽略,甚至于嘲笑,厌恶。这时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在那里有一座古城……而使这一切都生动,都温甜,都充满着“家”的气息的,是在这房子里有和自己相守十年的、幽娴贞静的淑贞。”(冰心2006:393)^①在整个故事中,时时可见施女士及其他美国人将中国美德等同于静默:“这样的人格,在跳荡喧哗的西方女儿里是找不到的。她是幽静的。”(396)

施女士将美国和中国两极化,特别是将缄默寡言与东方美德相联系,这一做法断然将其归入美国东方主义者行列。赵健秀及《唉咿!》文集的其他编辑者认为,西方将亚洲美德与沉默联系起来,应归因于“种族主义之爱”。虽然《唉咿!》文集的编辑者们指的是强加于亚裔美国人

的刻板印象,但他们的意见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衡量白人种族主义成功的标准之一是,那一(少数)种族的沉默以及保持或加强这种沉默所必需的白色力量……刻板印象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而运作,规定着大众社会的看法和期待。它规定社会只接受符合刻板印象范围之内的既定少数族裔。而相关少数族裔则被规定,作为回应,必须成为这一刻板形象,照其样子生活,谈论之,拥抱之,以其标准衡量群体和个人的价值,并相信之。刻板印象成功运作的结果是,该种族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创造性的、文化的力量而被中立化……现已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守护者,依赖于它,感激于它……鉴于少数民族惧怕白色文化之敌意以及白色文化威胁到该少数民族的生存,他们接受尚可接受的刻板印象就成为一种生存的权宜策略。(Chin et al. 1974: xxvii)

依《唉呀!》文集的编辑者之言,欧裔美国人赞美安静沉默、顺从白色权威的亚洲人,以贬低其他少数族裔,特别是敢于挑战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非裔美国人。同时,维持种族等级制度需要一种族裔合作,这也是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他指出,东方主义要求“[亚裔]的共谋以赋予其貌似有理的特质”(1997: 108)。施女士可能并非自觉地将刻板形象强加于淑贞,也可能是淑贞在自觉地按照刻板形象生活,但施女士反复赞美淑贞沉静之美德,实在具有刻板形象之意味。

这种收养的动态关系之所以有害,不仅体现在施女士将淑贞的寡言少语与中国的神秘相等同,而且体现在她对淑贞的人格物化(objectification),不断地把她比作异域的奇葩:

“淑贞,一朵柳花似的,飘坠进她情感的园地里,是在一年的夏天。……这个瘦小的、苍白的、柳花似的小女儿,在第一次相见里,衬着这清绝惨绝的环境和心境,便引起了施女士的无限的爱怜。”(2006: 394, 395-396)

正如吉原真理所指出的,20世纪初美国的东亚商品目录里收集了“很多照片和插图,内容不仅有出售的物品,如象牙雕刻、刺绣、瓷器……还有风景、人物,以及各种‘东方’意象”(31)。在施女士的思想中,淑贞也同样与中国的风景和文物融为一体。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人生就如春日的“一池死水般”(冰心2006: 394)的白种女人,是在一个圣诞前夕收养淑贞的:

炉火的微光里,淑贞默默地坐在施女士的椅旁,怯生的苍白的脸,没有一点倦容,两粒黑珠似的大眼,嵌在瘦小的脸上,更显得大的神秘而凄凉。施女士轻轻的握着淑贞的不退缩也无热力的小手……从微晕的光中,一切都模糊的时候,她觉得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子,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诗,王太太的一缕绣线,东方的一片贞女石,古中华的一种说不出的神秘的神秘的静默。(396)

这段话俨然是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子。施女士不是将淑贞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女孩来接纳,而是当作一份异国情调的圣诞礼物——一个神秘的富于中国艺术风格的“包裹”,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化身。淑贞可以说是她审美化的东方主义的重要部分。在此,作家冰心着力刻画了施女士对传统中国的迷恋:每当淑贞进入她的脑海,总是与“夏天的柳花”、“平流的小溪”等富有诗意的比喻相联系,这与淑贞日常真实朴素的表现,淑贞与天锡的对话形成巨大的反差。

由于淑贞符合其理想中的中国娃娃形象,施女士并不特别关心女儿的情感幸福,尽管她完全清楚这个年轻女孩在身体、言语及情绪上的抑制:

十年以来,在施女士身边的淑贞好像一条平流的小溪,平静得看不到流动的痕迹,听不到流动的声音,闻不到流动的气息。淑贞身材依然很瘦小,面色依然很苍白,不见她痛哭,更没有狂欢。她总是羞愁地微笑着,轻微地回答着,悄蹑地行动着。(396)

对淑贞的这一描写使人联想到一幅静止的中国人物画,而不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考虑到淑贞一直在施女士身边,其静默可能缘于感觉到养母毫不放松的监视。而施女士则从女孩的悄然寂静中获得极大的慰藉。她对淑贞的关照,得到女孩加倍的报答。淑贞成为她的勤谨的婢女——缄口随侍,无微不至照料养母所需:

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淑贞的床前的蹀躞,是甜柔的、无声的、无微不至的。无论哪时睁开眼,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笑的脸,从书上抬了起来。“这是天使的慰安!”施女士总想表示她热烈的爱感,而看着那苍白羞怯的脸,一种惭愧的心情,把要说的热烈的话,又压了回去。(396-397)

施女士将淑贞日夜不离的守候看作理所应当。她似乎感到只要这年轻姑娘做她的守护天使,为其“服务”,她就心满意足了。她未曾试图找出淑贞愁苦的原因,也不愿深入其内心深处去理解其忧郁。这个年轻女孩后来对天锡倾诉:“从我父亲去世后,我总觉得没有人能在静默中了解我”(403)。

在此,并非养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感情纽带,而是连接两人的不是相互理解,而是两个畸零之人的相依为命:

清明时节,施女士也带她去拜扫王先生和王太太的坟,放上花朵,两个人都落了泪。归途中施女士紧紧地握着淑贞的手,觉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畸零的人,一腔热柔的母爱之情,不知不觉地都倾泻在淑贞身上。从此旅行也不常去,朋友的交往也淡了好些,对于古董的收集也不热心了。只要淑贞一朵柳花,一片云影似地追随着自己,施女士心里便有万分的慰安和满足。(397)

施女士对这女孩的喜爱至少部分原因是她们有着相似的性格,这两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品质:温柔、沉默、内向、失意、腼腆。这位白人妇女身上也表现出此类属性这一事实表明,这些特质并非是中国人专有的,并非东方女性气

质之本质。施女士之母爱,尽管在上述引文中显而易见,但却被其占有欲和不经意的剥削削弱了。邱艳萍和李柏青在评论《相片》的文章中嘲讽地指出,施女士收养淑贞后不久就不再养狗或收集古董,好像“淑贞仅仅是供她排解寂寞的‘小狗’和‘古董’”(27)。虽然邱李二人未将施女士对淑贞的物化与东方主义相联系,但他们将施女士的母爱定性为“变态”与“独霸”。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这位美国母亲害怕淑贞的婚姻会使其失去女儿:

有时也想倘若淑贞嫁了呢?……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终身大事……而不知怎样,对于这幻象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怖!……一种孤寂之感,冷然地四面袭来,施女士抚着额前的白发,起了寒战,连忙用凄然的牵强的微笑,将这不幸的思想挥去。……偶然也有中国的老太太们提到淑贞应该有婆家了,或是有男生们直接地向施女士表示对于淑贞的爱慕,而施女士总是骄傲地微笑着,婉转地辞绝了去。(2006:397)

很少有母亲会将女儿的婚姻前景看作“不祥的”。但施女士关心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婚姻将导致其被撇下一人独处的后果。她希望淑贞永远留在她身边,其自私与母爱相去甚远,但与她对淑贞的物化则完全相吻合:淑贞是她的宠物、古董、婢女。

这两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在淑贞陪施女士回到新英格兰家乡之后尤为明显。在那里,这位白人母亲偶尔“在教堂的集会里,演讲中国的事情”,而中国女儿“总是跟了去,……问着中国的种种问题,……只腼腆含糊地答应两句”,“她的幽静的态度,引起许多人的爱怜。因此就有老太太有时也来找淑贞谈谈话,送她些日用琐碎的东西。”(398)此处,施女士显然被当作研究中国的权威专家,而淑贞则扮演着安静顺从的东方女孩。在此,施女士符合德里克所称的“中国化的西方人”(Sinified Westerner)形象,其“东方化”是其代表东方讲话的资格,而另一方面,淑贞是“自我东方化”的象征(Dirlik: 1997:110,111)。老太太们施舍般的态度,以及施女士对待养女的“监护”行为,令人想起斯塔

西丽·福特(Stacilee Ford)的“母性例外论”——指美国妇女在亚洲“利用其国家和性别身份,尤其是身为母亲或养育者的‘女性’身份,要求享有一定的权威”。

美国传教士对待中国的居高临下态度,小说中的天锡对此予以明确指出,并表达对白人有人居心的慈善赞助的不满:

我自己也是个教会学校的产品,可是我从小跟着祖父还读过许多旧书,很喜爱关于美术的学问。去年教会里送我父亲到这里入神学,也给我相当的津贴,叫我也在神学里听讲。我自己却想学些美术的功课。因着条件的限制,我只能课外自己去求友,去看书。——他们当然想叫我也做牧师,我却不欢喜这穿道袍上讲坛的生活!(2006:401)

教会对待天锡与施女士塑造淑贞的方式如出一辙。这两个年轻人领取了白人的慈善施予,同时就被缚上了无形的链条。天锡得到教会津贴研习神学,代价是必须放弃艺术追求。作为对教会经济资助的回报,他必须成为牧师,服务教会。同样,淑贞必须偿还养母之恩,代价是放弃独立、个人的成长,以及对幸福的追求。

天锡谴责美国传教士的人种论凝视,质疑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性,想当然地认为一下子就可以将中国加以概括归纳——特别是通过他这个“内部观察者”——通过天锡这一形象,冰心预言了萨义德对惯于简化的殖民主义认识论及随之产生的等级观念的批判:

更使我不自在的,有些人总以为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在神学里承他们称我为“模范中国青年”,我真是受宠若惊。有些自华返国的教育家,在各地作兴学募捐的演讲之后,常常叫我去上台,介绍我给会众,似乎说,“这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中国青年,你看!”这不是像耍猴的艺人,介绍他们训练过的猴子给观众一样么?我敢说,倘若我有一丝一毫的可取的地方,也决不是这般人训练出来

的!(402)

天锡对教育集会上教育家们之言行的严厉批评,不仅预言了萨义德的后殖民论说,几十年后,还得到了《唉咿!》文集的编辑者及其他亚美研究学者的呼应。《唉咿!》文集的编辑者们关注“种族主义之爱”,费伦斯质疑白人的凝视,多位亚裔美国学者,比如维克多·巴斯克萨(Victor Bascara)、刘大伟、骆里山等均质疑白人社会对“亚裔美国模范少数民族”的建构。

“种族主义之爱”和“种族主义之恨”,指白人社会褒扬接受白色文化为优越文化的少数民族,贬斥挑战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此一致,在20世纪之交,美国传教士称赞那些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人而谴责那些坚持崇拜祖先者为异教徒。正如天锡所观察到的,即使是华人基督徒也不能免受白色文化的凝视,被当作传教的战利品而供展览。他气愤于这种偷窥癖般地将人物化及赞助的方式。他对为即将到华布道的传教士举行的欢送会的描述,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贬低:“行者起立致词,凄恻激昂,送者也表示着万分的软服与怜悯,似乎这些行者都是谪逐放流,充军到蛮荒瘴疠之地似的!”(402)。

将中国与瘴疠蛮荒联系起来,这种负面联想似乎与施女士的观点截然相反。相比于喧闹的美国青年,施女士更喜欢恭敬有礼的中国青年,从而对淑贞严格管教,将之培养成纯粹的“中国人”:

人人都夸赞施女士对于淑贞的教养,在施女士手里调理了十年,淑贞并不曾沾上半点西方的气息。洋服永远没有上过身,是不必说的了,除了在不懂汉语的朋友面前,施女士对淑贞也不曾说过半句英语。偶然也有中学里的男生,到家里来赴茶会,淑贞只依旧腼腆地默默坐在施女士身边,不加入他们的游戏和谈笑,偶然起来传递着糖果,也只低眉垂目的,轻声细气的。(397)

当美国传教士诽谤中国成为惯例,施女士的亲华态度在人们看来或许是一个例外,值得

赞许。但是,为确保淑贞符合其既有的中国典范之概念,施女士之自私,其建构刻板形象之罪咎,相比其同胞并无二致。其倾注于淑贞身上的种族主义之爱,与公然诽谤中国文化的传教士之种族仇恨只不过互为表里。此外,淑贞的中国性不是在与其它中国人的交往中养成的,而是在幽禁于施女士身边时被塑造的,是被施女士的臆想——“这青年人的欢乐的集会,对于淑贞却只是拘束,只是不安”(397)——规约而成的。在新英格兰,一旦离开施女士警戒的注视,淑贞则乐于领略年轻人特别是天锡的陪伴,由此,我们必须将其所谓的偏好独处理解为她对养母意愿的迁就,是养母对其中国式培养的一部分。

在《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克里斯蒂娜·克伦(Christina Klein)区别了二战之前与之后欧洲关于亚洲的叙述:二战之前亚洲人被描述为低人一等的种族,而二战之后的美国高扬“种族包容”,为支持战后扩张的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她继而论述道:“通过建立情感上的连结以弥合差异……情感就成为实施权力的工具”(2003 x-xi,xiv-xv)。虽然《相片》出版于二战以前,但却涉及到了克伦所论述的两种形式的东方主义——要么把亚洲人看得低人一等,要么对亚洲人表达白人的同情。尤其具有相关性的,是其对跨种族收养“双刃剑”作用的论述。

从赛珍珠 1949 年所发起的“欢迎之家”(Welcome House)(为美国出生的亚裔或有亚裔血统的孩子寻找家庭的收养机构)引开去,克伦把跨种族收养与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联系起来:

战后中产阶级文化中占显著地位的白人母亲……具有非常复杂的谱系……非白色孩子的白人父母形象长期以来成了一种比喻,象征着貌似自然的等级与控制关系。把种族他者和边缘社会族群幼儿化,是使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标准修辞手段。(2003 :175)

从其不经意中对淑贞的掌控,施女士似乎成了战后中产阶级白人母亲形象的先驱者。施女士的占有欲,从她在中国期间摒弃任何有关

淑贞的婚姻的想法或建议之时已见端倪,在故事结尾当她看到天锡为淑贞拍摄的相片时则表露无遗:

施女士忽然地呆住了!

背影是一棵大橡树,老干上满缀着繁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贞正俯着身子,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卷着袖,是个猛抬头的样子,满脸的娇羞,满脸的笑,惊喜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动,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

一阵轻微的战栗,施女士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无名的强烈的激感,不是惊讶,不是忿急,不是悲哀……她紧紧地捏住这一张相片——(2006:405)

毫无疑问,淑贞对天锡萌发了爱情,这对施女士无疑是一大打击。对施女士而言,这张照片让她第一次看到淑贞的情感、活力和女性的魅力。由于她一心要将淑贞培养成娴静端庄的中国女子,这种变化让她十分震惊。

另一方面,在淑贞与天锡初次见面单独相处时,读者已经看到这女孩开始焕发生气。在听了天锡对美国传教士的批评后,淑贞“觉得椅前站着的一个高大的身影,这影儿大到笼罩着自己的灵魂,透不出气息。看着双颊烧红,目光如炬的太兴奋了的天锡,自己眼里忽然流转着清泪”(402)。这眼泪意味着,天锡慷慨激昂的演说引起淑贞深切的共鸣,也许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养母所建构和规定。不同于施女士将淑贞看作中国古代艺术的化身,天锡从淑贞身上感受到的是中国的新鲜气息,“似乎觉得有一尊‘中国’活跃的供养在我的面前”(403)。无论天锡对淑贞的感觉是否比施女士准确,两者的差异表明,施女士形成养女怯懦冷淡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母性的幻想,这一印象或许还被淑贞不得不扮演讨好养母的角色强化。

看到这张标志着养女成长为充满活力、感性的年轻女性的相片,施女士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和高兴,反而觉得受到严重的打击。她无法形容的困惑可以被诊断为“东方主义的忧郁

症”——这是海外华人学者周蕾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认为当代中国作家比不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古代诗人的白人汉学家:“但这种对他者不忠诚的道德说教和控诉遮蔽了更加根深蒂固的焦虑……那个为汉学家们所洞察的中国的过去正在消失,而他们自己正是被抛弃的主体……“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历史关系被颠倒过来”(Chow 1993:4)。施女士也经历了同样的失落:原以为自己如此“了解”的中国女孩,如今却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一时使她迷失了方向。

小说以“相片”作为标题,不由得令人想起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的观点:“摄影业最辉煌的成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将整个世界——作为一本图像集纳入头脑中……所谓摄影,就是占用拍摄对象,亦即将自己置于与世界的一定关系中,使自己觉得拥有知识等,从而也拥有了权力……它将人变成可以象征性地拥有的物品。”(1973: 3-4,14)按照桑塔格的说法,摄影,作为一种体现摄影者之掠夺性视觉的艺术——似乎可以作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绝佳比喻。冰心的标题同样提请读者注意“视角”的特别方式,不过其内涵已作了有意扭转。虽然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但对各个人物的描述,大都是以施女士的有限视角为中介,经过其东方主义视镜的过滤。不过,作者安排天锡为故事中的摄影者,其用意在于帮助读者发现,施女士对中国人物特别是淑贞的描述,其视角是扭曲的、倾斜的。如果说摄影如桑塔格所称的往往被用来为殖民主义服务,那么冰心则以其作品表明,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殖民者之工具来解构其掠夺性视角,通过天锡的照片,削弱了东方主义者对“木讷的中国女子”的建构。

天锡为淑贞拍摄的相片使施女士大为震惊,因为在其视觉中淑贞已经定格为一幅“静物”画,而相片中的淑贞却充满了朝气,这两者是如此之不同,使她大受打击,她甚至觉得遭到背叛,被欺骗了:她自己花费多少苦心建构、维护淑贞的东方形象,到头来却只是一种虚饰。她对充满了朝气的淑贞的照片的反应,逆转了桑塔格的另一个假设:“所有的照片都是纪念物,所谓摄影,就是对人或物的入侵,侵入

其有限、脆弱、变化……联系或声称拥有另一种现实”(1973:15)。而施女士远不能入侵另一个人的变化;反之,看到淑贞身上洋溢着青春气息,施女士不禁想起自己逐渐褪色的容颜:“猛抬头看见对面梳妆台上镜中的自己,蓬乱的头发,披着的一件绒衫,脸色苍白,眼里似乎布着红丝,眼角聚起了皱纹……”(冰心 2006: 405-406)。而“苍白”这个形容词是她先前用来描述淑贞的。在此,“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呼应周蕾的说法)、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颠倒过来。

最重要的是,这张照片触发了她对一直以来最为害怕的事情的担心:淑贞的婚事。虽然她没有明确将其惊恐归因于淑贞的婚姻前景,但她看到照片时的反应,使人想起之前每想到淑贞的婚事就给她造成的心理困扰:“有时也想倘若淑贞嫁了呢?……施女士……起了寒战,连忙用凄然的牵强的微笑,将这不幸的思想挥去”(397)。在这两处,施女士都恐惧得“寒战/战栗”起来。这张照片无疑使施女士脑海中浮现这一情景:淑贞嫁给了天锡,她就要失去淑贞了。她再也无法继续否认是她每每挥去有关淑贞婚事的念头。她紧紧地捏住这张相片,既反映其对将同时失去对这名中国姑娘的思想和身体的控制而感到恐惧,也揭示,在占有欲驱使下,她决心要将养女牢牢掌握在手里。

这张相片是在施女士缺席的一次外出活动中拍摄的。由于生病,她不能参加年轻人的郊游:“原想叫淑贞也不去,在家里陪着自己,又怕打断了大家的兴头,猜想淑贞也是不肯去的,在人前谦让了一句”(405)。施女士内心所想暴露了她对养女的操控,也显示其对养女的了解很有限。不料,淑贞竟然“欣然地答应随着大家走了”(405)。淑贞欣然弃施女士而去,不禁令人想起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故事《记住你是个黑鬼》(“Member Youse a Nigger”),故事中白种主人以为其忠实奴隶约翰在奴隶解放后仍然会留在这一“充满爱意”的家庭,不料约翰更乐意离开:“奥莱·马萨一直呼唤着他,声音很可怜,但约翰脚不停步,朝着加拿大走去”(1935:90)。淑贞或许对施女士心怀感激,但她也希望从白人主妇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新英格兰淑贞变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幼鸟。其所谓的拘谨内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施女士的约束,而不是其固有的中国性格。淑贞由内向转为外向可归因于天锡的影响,也可归因于他们所接触的美国环境。不同于施女士,天锡鼓励淑贞融入美国青年群体,让淑贞对在美国上大学有了兴趣。尽管施女士也曾有这一想法,但她看到相片后就突然改变了主意:“孩子,我想回到中国去”(冰心 2006:406)。

正当淑贞开始显示活力,坠入爱河,追求自己的生活之时,施女士却决定将她带回中国,这显然是不理智的。然而这恰恰是施之意图,欲将青春与爱情之花扼杀在萌芽状态。毫无疑问,她认为,将淑贞带回中国后,没有天锡在场,这女孩将回归她所希望的角色:安静,顺从,永远守在她身边尽忠尽孝。尽管她好意收养淑贞,却以殖民主义者的眼光将淑贞看作“他者”,看作她这个白人女子的附属物,应该以终身的服务来报答她。对于施女士的决定,淑贞的反应尚不可知,她或许会反对养母,选择留在美国;或许天锡会与她一起回到中国,把浪漫的爱情置于忠孝之上。由于小说发表于西方影响日盛的历史时代,旧的行为规范正面临挑战,这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该短篇小说的发表比赛义德的《东方学》以及《挨啾!》早了几十年,但其中已经包含了这些理论主张的核心概念。虽然更为常见的是学者将现有理论运用于文学中,但我的分析表明,从小说作品中产生理论同样是贴切的、有益的。冰心早在二战前就揭露了施女士隐匿于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对淑贞的爱怜这一“温情脉脉”面纱之下的殖民心态,并通过天锡之口,明确道出白人传教士之东方主义人种学者的凝视,显现出她比其时代更具见识。正如多米尼加·费伦斯(Dominika Ferens)所指出的,“定义亚洲”,在 19 世纪“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及普通旅行者之职责”(19)。《相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早期文学个案,揭示新英格兰的传教士如何积累此类人种学知识,施女士如何按照此类对东方的刻板化理念来培养淑贞。天锡建议淑贞多与美国人交往,以此来了解另一文化,这似乎是了解“他者”的更为可行的方式。虽然

天锡也对西方加以归纳(“我总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泼与勇敢,……,我很少看见美国青年有像我们这般忧郁多感的。”[冰心 2006:403]),但其见解是从实际交往而不是基于人种学研究得来的。小说中的施女士尽管在中国呆了数十年,但选择了崇尚以古代艺术形式存在的中国文化,却把自己和养女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中国人隔离开来。

该短篇小说犀利地批判那种简单下结论的认知方式,并预示了赛义德的精辟见解,即“将西方与东方分隔之界线……与其说是自然使然,远不如说它是人为制造的更符合事实”(1986年,转引自 Dirlík 1997:106)。小说中,施女士与淑贞同样具有内向性格,她视淑贞为旧中国之体现而天锡则视其为新的中国之化身;施女士与其传教士同胞就中国是文明的摇篮抑或是野蛮人的温床产生分歧,天锡所形成的美国人热情开朗的印象完全不适用于施女士身上,这种种矛盾的事实都表明,人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的主体间的知识。

这一叙事同时也模糊了中国与美国华裔写作之界线。在说明东方主义的三个方面——施女士的种族主义之爱、美国传教士的种族主义之恨以及淑贞无意中扮演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小说所捕捉的许多重要主题,正是后来《挨啾!》的编者所阐述的。此外,小说描写在华白人妇女及在美华人青年的疏离感时,揭示了跨国移徙及文化适应之艰辛复杂的过程。施女士在中国和美国的双重流亡感与许多早期亚洲移民,包括康永山(Younghill Kang)的《东方走向西方》(*East goes West*, 1937)中的主角、桑托斯(Bienvenido Santos)的《苹果之香》(*Scent of Apples*, 1955)中的农民以及拉赫瑞(Jhump Lahiri)的《同名者》(*The Namesake*, 2003)中的父母等的移民经验产生共鸣。同样,淑贞和天锡在新英格兰感受到的疏离感,与水仙花(伊迪丝·伊顿)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拾零》(*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 1909)中所描述的经验非常相似,但《相片》与水仙花的短篇小说《兵与兵》(*Pat and Pan*, 1912)却形成鲜明对比:在 *Pat and Pan* 中,收养母亲与其所收养的孩子的种族身份正好换位,而作者通过跨种族收养“批判了传教

士的同化进程”(Callahan 2011:158)。同时,淑贞与天锡所遭遇的“人格物化”(objectification)也使人想起夫野渡名(温尼弗雷德·伊顿)(Onoto Watanna/Winnifred Eaton)的《樱次郎与三头少女之恋爱故事》(*The Loves of Sakura Jiro and the Three Headed Maid*, 1903)中的樱次郎(Sakura Jiro),该故事讲述了一个日本移民如何在新大陆以表演惹人注目的畸形人节目来勉强维生。

而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的传记小说《木鱼歌》(*Wooden Fish Songs*, 1995)与《照片》尤其具有可比性。《木鱼歌》描绘了范妮(一个白人妇女)对其收养的中国儿子刘锦浓(Lue Gim Long, 1858- 1925)占有性的爱。施女士与范妮这位“白人妈妈”具有很多共性。范妮认为刘锦浓是她的“创造”,把他既当农务黑奴又当家务黑奴使唤,要他照料果园,服侍于她的病榻前,施女士试图按照自己既有的东方主义形象来塑造淑贞,并希望得到对方无条件的感恩。唯一不同的是,范妮把刘锦浓基督徒的行为举止归功于自己的影响,而施女士则把淑贞的沉静归因于东方女性气质。

考虑到《相片》与亚裔美国文学文本的诸多共性,我建议将其与蒋彝(Chiang Yee)、林语堂(Lin Yutang)、容闳(Yung Wing)和伍廷芳(Wu Ting Fang)等人的作品一起归为早期美国华裔写作。与上述作家一样,冰心曾在美国度过相当一段时间而且在其作品中(至少在此短篇小说中)书写美国亚裔的经验,符合张敬珏(King-Kok Cheung)与斯丹·尤根(Stan Yogi)在《亚裔美国文学:注释书目》中对亚裔美国作家的宽泛定义(1988 :v- vi.)。我们论及的许多二战前华人作家都聚焦在美华人的美国经验,唯独冰心关注一名欧裔美国女性在中国的相应经验。

该故事与亚裔美国文学亲缘关系在批判美国东方主义和中国父权家长制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中国亚美文学研究先驱学者及北京亚美文学研究中心创始人吴冰(恰巧也是冰心的女儿),曾有一篇论文题为《从华裔美国文学中了解美国、中国、及华裔之美国》(2008a)。通过描写新英格兰的基督教会、二战前中国的生活以及在美国华人青年的经验,《相片》有助于人们了解吴冰所讲的三个方面。吴冰认为亚裔美

国文学是中国读者的“反思文学”,质疑“滴水之恩,当以泉涌相报”的报恩思想——这个故事也符合这一说法,因为它促使人们思考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局限与长处。不同于邱、李二人将淑贞视为中国文化的两个积极面之化身,即旧中国的传统美德和新生中国的进步力量(2000 :22),我认为,作者希望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所灌输的缄默寡言、恭顺尽孝之观念及报恩思想。

这些价值观,经施女士的西方眼光陌生化之后,更具令人不安的意味,使作者得以同时批评美国东方主义和旧时中国女性典范。施女士不断强调沉默这一“东方”美德以及相信回中国后淑贞将继续对她尽忠尽孝,这并不仅仅是暴露其刻板眼光。因为除了怕淑贞出嫁而失去养女的恐惧,施女士的其它家庭观念——或许也对青年人的成长有害——与传统的中国父母相比并无多大的差异。在遇到天锡前,淑贞遵从的不仅是白人养母,也是中国父权制对女性的规定。在新英格兰,当施女士在教堂集会上介绍中国,淑贞静静地坐在一旁,允许这个美国母亲作为中国文化之唯一权威,这无异于与文化霸权共谋。尽管天锡也不愿在美国听众面前介绍中国,但这是出于他合理的推论,即任何关于这个泱泱大国的论断都不可避免地流于简单武断。天锡与施女士不同的另一方面是,他眼中的“新中国”之形象——活泼、热情、外向——正如其为淑贞拍摄的相片所捕捉到的,为女性特质提供了另一定义,这种女性特性定然比施女士所喜爱的中国画中那种腼腆、纤弱的人物形象更具活力。

就当下广泛存在的跨国收养来看,对传统价值的归属、保护与重新刻写还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克伦认为,冷战时期对亚洲孤儿的跨种族收养并不是个人的私人行为,而是伴随着政治后果的文化议题。《照片》中的跨种族收养,可以被解读为克伦所述的冷战时期收养模式的先例,为一直争议不休的对跨种族被收养者文化培养途径的长期可行性作出了令人警醒的贡献——尤其是针对那些被欧美裔父母收养中国女孩的个案。被收养子女是否应按照中国传统价值观或根据养父母的习俗和信仰来抚养?这显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正如郑永

生所指出的,围绕跨种族和跨国家收养所产生的问题,是“对西方在文化身份和真实性问题上所持文化态度的重要思考。”(64)对于为白人养父母所广泛接受,旨在帮助在美的中国被收养人了解其祖先文化的“遗产事业”,郑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这种选择不可能是基于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而是基于文化刻板印象……其结果是经常(且无意识地)造成东方主义以及对某一被异国情调化的他者性的拜物心理,对被异国情调化但已逝去的过去的缅怀,或是陷入雷纳多·罗萨尔多所说的“帝国主义之怀旧情绪”……当不涉及种族差异时,也就是说当被领养者是白种婴儿时,我们不会担心同样的原真性问题(2004:79-80)。

基于种族差异和个人喜好,施女士有意识避免淑贞受其西方文化传统影响,她故意不与淑贞说英语,不教她美国文化,但这种作法剥夺了其养女宝贵的双语及双文化经验。强调通过跨文化交流来拓展自我之重要性的,反而是天锡——这位西方传教士最激烈的批评者:“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国外光阴,来游历,来读书,”他告诉淑贞,“我总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泼与勇敢,……您也应该加入他们的团体,来活泼您的天机。”(冰心 2006:403)

施女士对其养女怀旧式的、文化主义的建构,如前所述,被天锡对淑贞的印象削弱,天锡认为充满朝气的淑贞体现着“新的中国”的形象,这形象作为捣毁偶像的“五四”运动(1919~1926)及其后的中国性体现,其真实性决不亚于施女士的怀旧式中国印象。这一时期,中国质疑儒家文化思想,西方观念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早在跨国收养事例激增之前,这一反映跨国接触的早期文学故事已经告诫人们,将被收养人本质主义化以及将他们作为文化战利品看待存在着危险。

最后,这个故事令笔者想到人们对冰心带性别倾向的接受。虽然冰心被认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之一而备受尊敬,其作品被收进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中小学教材,但她主要是

作为面向青少年读者的作家而知名的。从某种方面讲,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作者显然将创作精力的大部分投入为年轻读者写作——其著名书信集即是以《致小读者》为书名。但是,我认为,其身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进一步使其被归类为主要关注“家庭事务”而不是国家和跨国问题的作家。在一篇谈论她所喜爱的作家巴金的杂文中,冰心曾为了获得“更多的稿费”而采用“男士”作为笔名(2005:400)。在这一点上,她的情形与其同时代的赛珍珠(1892~1973)类似:赛珍珠的许多后期小说都用男性笔名约翰·西吉斯(John Sedges)发表,因为尽管她作为“‘大众欢迎的中国专家’,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作品却一直被看作‘女人的文学’,……不同于伟大的男性作家的作品”(Yoshihara 2003,168)。与冰心同时代的“伟大的男性作家”是巴金、鲁迅、茅盾、老舍等,他们以其对封建中国的政治洞见和批判而引人瞩目,而冰心的名声则主要建立在其格调清新的散文、细腻微妙的心理描写以及爱情哲学上面。

然而,冰心或许是第一个在短篇小说中以一名美国妇女的故事来扭转东方主义之凝视的中国作家。历史学家大卫·罗迪格(David Roediger)指出,“白人作家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有色人种之生活、价值观和能力最为领先的、最冷静的观察者,而有色人种作家,尤其是非洲裔作家,被认为其所提供的有关少数族裔的生活和经验的见解往往十分主观”(Roediger 1998:4)。有鉴于此——将其拓展到太平洋区域的语境中,冰心挑战白色权威的这一尝试无疑极具突破性。除了施女士不在场时天锡与淑贞谈话这一部分外,《相片》是从一个对其东方主义倾向浑然不觉的白人妇女的视角叙述的。正如其以“相片”为题名颠倒了桑塔格所说的殖民主义关系,其叙事同样打乱了既定的东方主义等级秩序。在施女士将养女视为人种学考察对象加以观察的同时,其本人也受到作家冰心的凝视。

但冰心对施女士的刻画要比施对淑贞的观察远为细致。施女士心理之复杂性类似于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严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 1933)中的白人女主角梅根·戴维斯(Megan Davis),这个女人觉得严将军具有的某种气质既吸引又拒斥着她,使她在

“逃离严将军和把他转化为基督徒”之间犹豫、踌躇(Palumbo-Liu 1999:59)。施女士对中国的态度同样是纠结的:她决定留在中国反映了她作为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融入陌生文化的意愿,但她将淑贞当作中国娃娃永久留在身边做侍女的企图暴露了她“东方主义的忧郁症”和“帝国主义的怀旧病”。

不同于种族中心主义的作家,冰心在故事叙述中保持了一种细腻的交叉与平衡:在政治层面上,她同情淑贞,反对以施女士和新英格兰传教士为代表的美国东方主义;而在心理层面上,这种关系被颠倒过来:小说更主张美国个人主义和自我发展,而不是家庭和民族的认同。在心理层面上,中国对施女士的吸引力不亚于淑贞对美国的迷恋,作者似乎站在施女士一边。虽然我聚焦于跨种族政治,强调作家预示东方主义的先见,但作品对施女士细致入微的刻画——对一个选择单身、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大半生的老年妇女绝佳的性格剖析——同样值得我们的关注、欣赏。借用德里克(Arif

Dirlik)的话,施女士代表了“‘被东方化的’东方主义者……她自己正处于进入‘东方’的过程中”(1997:119)。

以后殖民理论和亚美研究的理论视野阅读这篇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冰心极具先见和颠覆性的一面。其非凡气魄使她敢于让一个白人妇女独揽叙事“权威”,其娴熟的艺术手法表现出跨种族收养之动态性与复杂性;其文学感性使她得以关注叙事的政治和心理层面,跨越时空局限,实在令人叹服。在大多数中国作家将批判火力瞄准中国的封建制,视西方为拯救民族危亡之思想来源时,冰心却揭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等级关系,并对帝国主义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早在1934年,冰心就传达出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与普遍性(Universality)之间的差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谨以此文纪念吴冰教授(编者按:吴冰,冰心之女,2012年3月30日去世,享年77岁。)

参考文献

- Bascara, Victor(2006)*Model Minority Imperi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ing Xin [冰心](1992)“The Photograph”, in *The Photograph*, trans. Jeff Book, Beijing: Panda Books, pp. 234- 259.
- (2005)[1989]“About Men(8):The Most Endearing and Admirable Author[关于男人(之八):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in 贾焕亭 [Huanting Jia](ed.)《冰心集》Bing Xin Ji [Collected Works by Bing Xin], Guangzhou, China: 花城出版社[Huacheng Chubanshe], pp. 399- 401.(2006)[1934]“相片 [The Photograph]”in 《冰心作品精编》[Bing Xin Zuopin Jingbian]ed. Ru Zhuo[卓如], Guilin, China:漓江出版社[Lijiang Chubanshe], pp.393- 406.
- Callahan, Cynthia (2011)*Kin of Another Kind: Transracial Adop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heng, Vincent John (2004)*Inauthentic: The Anxiety over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Cheung, King- Kok, and Stan Yogi, eds (1988)*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Chin, Frank, and Jeffery Paul Chan (1972)“Racist Love.”*Seeing Through Shuck*. Ed. Richard Kostelanetz. New York: Ballantine: 65- 79.
- Chin, Frank, Jeffery Paul Chan, Lawson Fusao Inada, and Shawn Wong, eds (1983)[1974]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IIIIIIIIII!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Chow, Rey (1993)*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 Barbara(1987)“The Race for Theory.”*Cultural Critique* 6(Spring): 51- 64.
- Dirlik, Arif (1997)*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Ferens, Dominika(2002)*Edith and Winifred Eaton: Chinatown Missions and Japanese Romanc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ord (Hosford), Stacilee (2002) "Gendered Exceptionalisms: American Women in Hong Kong and Macau," dis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Troubling American Women: Narratives of Gender and N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urston, Zora Neale (1990) [1935] "Member Youse a Nigger", Mules and Men. New York: Harper & Row, pp.70-90.

Kang, Younghill (1997) [1937] East Goes West: The Making of an Oriental Yankee, New York: Kaya.

Klein, Christina (2003)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hiri, Jhumpa (2003) The Namesak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McCunn, Ruthanne Lum (2007) [1995] Wooden Fish Song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alumbo-Liu, David (1999)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Qiu, Yanping and Li, Baiqing [邱艳萍、李柏青] (2000) "Culture and Character in the Mirror: An Analysis of Bing Xin's 'The Photograph' [镜想中的文化与人性—冰心小说《相片》读解]" Xiongzhou University Newsletter [琼州大学学报] 1:21-32.

Roediger, David R. ed. (1998) Black on White: Black Writers on What It Means to Be Whit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Said, Edward W (1994)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Random House. (1986)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in Francis Baker et al. (eds)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ory: Papers from the Essex Conference, 1976-84, London: Methuen: 210-229.

Santos, Bienvenido (1979) [1955] "Scent of Apples", in Scent of Apples: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21-29.

Shu-mei, Shih (2001) The Lure of the Moder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ontag, Susan (1973)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Sui Sin Far [Edith Eaton] (1995) [1909] "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 in Amy Ling and Annette White-Parks (eds) 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218-230.

(1995) [1912]. "Pat and Pan", in Amy Ling and Annette White-Parks (eds) 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160-166.

Watanna, Onoto [Winnifred Eaton] 2003 [1903] "The Loves of Sakura Jiro and the Three Headed Maid", in Linda Trinh Moser and Elizabeth Rooney (eds) "A Half Caste" and Other Writing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60-66.

Wu Bing (2008) "Read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o Learn about America, China, and Chinese America", Amerasia Journal 34.2:99-108.

吴冰 (2008) "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 [Concern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外国文学评论》 Foreign Literary Criticism 2:15-23.

Yoshihara, Mari (2003) Embracing the East: White Wome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① 本文所引用《相片》的原文均来自卓如编《冰心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3-406 页。